

淺談「極」間外交

尹慶耀

自尼克森總統倡言談判紀元以來，國際間展開一場外交戰爭，自是意料中事。當整個世界進入一個活躍的外交季節時，最受人注目的當然是大國外交，甚至可稱為「極」間外交。

單說今（一九七三）年罷。

就美國方面言，二月一、二日，英國首相希斯（Edward Heath）；四月十七、十八日，義大利總理安德洛提（Giulio Andreotti）；五月一、二日，西德總理布朗德（Willy Brandt），都曾先後分別訪美與尼克森會談。美、法兩國總統，則於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一日，在冰島首都會晤。尼克森與田中角榮的會晤，則預定於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一日舉行。

就蘇聯方面言，一月十一、十二日，布里茲涅夫（Leonid Ilich Brezhnev）與龐畢度（Georges Pompidou）在蘇聯舉行過會談。五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他訪問西德與布朗德會談。六月十六日至二十六日，他訪問美國與尼克森會晤。歸途中訪問法國會晤龐畢度。他和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的會談，原定於八月下旬在蘇聯舉行，嗣由蘇聯要求延期，時間或許要遲上一個月。而包戈尼（Nikolay Viktorovich Podgorniy）則有訪問埃及之說。

就毛共方面言，過去它幾乎已邀約過全部西歐重要國家的外長到中國陸訪問。今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十八日，廖承志率領了五十人的代表團，到日本去做了一次統戰旅行。僑外長姬鵬飛於六月六日抵達倫敦，開始了他的歐洲之旅。北平更時常歡迎第三世界國家的首腦，但那已列不進「極」

間外交之內了。

此外，四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安德洛提與田中角榮；三月一、二日，五月二十八、二十九日，希斯與布朗德，都曾分別舉行過會談。布朗德與龐畢度之間，則於六月二十一、二十二日會晤。

「極」間外交的特點之一，可說是首腦外交。這一則是現實的國際環境使然，再則和美國當前的作法有關。

季辛吉（Henry A. Kissinger）反對「官僚的實用主義」，他認為巨大的官僚機構，會削弱政治指導的創造性而促成所謂僵化，他主張總統應擺脫對官僚的依畀，另設獨立於官僚機構之外的特別助理。想來尼克森是支持這種見解的，他和季辛吉成了搭檔，而把外交重心由國務院逐漸移向白宮。

季辛吉認為毛共官僚化水準較低，其領導者個人權威有壓倒性作用，因之，它反而有急激轉變的可能性（註一）。事實上，毛共的外交決策，也確實掌握在獨裁者手中（註二）。

蘇聯當前實行三頭馬車的集體領導，因之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總理柯錫金（Aleksy Nikolayevich Kosygin）、最高蘇維埃主席（名義上的元首）包戈尼，都出馬作外交旅行，但真正握有最高權力的首腦無疑是布里茲涅夫。今年四月二十六、二十七日的蘇共中央全會中改組了政治局，被指為有「民族主義傾向」的謝列斯特（Petr Efimovich Shelest）和與布里茲涅夫有磨擦的沃羅諾夫（Gennady Ivanovich Voronov）均被罷黜（註三），而外交部長葛羅米柯（Andrey Andreyevich Gromiko）、國防部長格列奇柯（Andrey Antonovich Grechko）和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安德羅波夫（Yury Vladimirovich Andropov），被新任為政治局委員（註四），而委

員名額也由十五人增至十六人。這次人事調整，更加强了布魯的地位，便利於他對外交政策的推行。

在法國，經龐畢度任命於今年四月五日組成的麥斯邁(Pierre Messmer)第二任內閣中，由饒貝爾(Michel Jobert)取代徐滿(Maurice Schumann)為外交部長。饒貝爾原任總統府祕書長，這項人事安排，顯然使得龐畢度總統親自處理外交事務更較便利。

其他內閣制國家由總理親自出馬，也就可列入首腦外交之林了。

在首腦外交方面，毛共有其天然缺點，毛澤東既不能外訪，周恩來似乎也不敢離開大陸，廖、姬之流雖也重要，但究不算首腦。法國總統龐畢度預定九月有中國大陸之行，英國的奚斯首相也將於年內訪平，但都還沒有成行。北越勞動黨第一書記黎笋和總理范文同率領的黨政代表團，於六月四日往訪毛共，會見了毛澤東。這二人確屬首腦，且如此相偕出國訪問尚屬首次，其重要性可知。但北越是不進「極」內的，今後他們或許還會前往蘇聯、東歐，去求取援助哩。

在當前這個「極」間外交的旺季裏，毛共是決不佔上風的！

「極」間外交都以和平為名，在姿態上又表現得有彈性（共黨稱為靈活性），但有誰會忘記充實自己的實力？有誰不想在國際間取得比較有利的地位？有誰真會放棄自己的原則與立場？說這是策略轉換或戰略部署，想來並無大礙。

這種轉換，胎動於一九六八年，正式開始於一九六九年。

一九六八年八月，蘇聯武裝侵捷後，壓服了東歐的不穩現象，使得毛共也惹惹畏懼。十一月初，聲稱當選後第一件事就是嘗試與毛共接近的美國總統候選人尼克森競選獲勝（註五）。同月二十五日，毛共駐波蘭代辦陳東通知美國駐波大使，定期恢復被毛共一再拖延的一三五次華沙會談。翌（二十六）日，毛共「外交部新聞司」發言人談話，建議於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日舉行一三五次華沙會談，接着說：「到那個時候，美國的新總統已經上任一個多月了，美國方面大概就可以拿定主意了」。這次會談雖因毛共駐荷蘭外

交人員廖和叔投奔自由而又告延期，但說毛共有意與美國恢復接觸，藉以擺脫文革造成的國際孤立形勢，大致是不會錯的。

真正的改變在一九六九年。那年一月二十日，尼克森總統在就職演說中，提出了談判時代的口號。七月間他動身訪問若干亞洲和東歐國家（註六）。當他啓程（二十二日）的前夕，美國務院宣布放寬對中國大陸貿易和旅行的限制，開始單方面對毛共示惠。二十五日他抵達關島發表談話，透露了美國新亞洲政策的輪廓和尼克森主義的雛型。十一月，佐藤榮作訪美，美國決將琉球行政權交還日本，但佐藤也聲明將台灣地區及朝鮮半島的和平與安全，視為日本安全之重要因素。

一九六九年六月，蘇聯召開了七十五個共黨的國際會議，對黑魯曉夫遺留下來懸而未決的第三次世界共黨會議作了交代。另一方面，西德總理布朗德自一九六九年就任以來，即標榜所謂東向政策，十二月八日即由西德駐蘇大使艾拉德(H. Allardt)與葛羅米柯，就雙方放棄使用武器條約開始進行談判。這正符合蘇聯避免腹背受敵的傳統願望。

當時蘇聯與毛共的關係，却不是緩和而是緊張。一九六九年三月初，珍寶島衝突爆發。毛共四月召開九大，五月恢復外派「大使」以改善其孤立形勢。但它和蘇聯的軍事衝突却愈演愈烈。八月間在新疆裕民縣，演變成包括直昇機、坦克、裝甲車在內的武裝對抗。如果最近外電所傳美國曾阻止蘇聯對毛共發動一次預防性的核子突襲的說法不虛，其時間就應該在上述事件前後（註七）。因為九月十一日，柯錫金於參加胡志明喪禮後返國途中，突然從中亞細亞折返北平，在機場和周恩來會晤，決定自十月二十日起在北平舉行副部長級的邊界談判，那表示蘇聯已暫時延緩它對毛共的突襲計劃（假如有那麼一個計劃的話）。另從毛共的反應看來，它也確實害怕會有那麼一個計劃。毛共發布的同年偽「慶」紀念口號第二十二條說：「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反對任何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特別要反對以原子彈為武器的侵略戰爭，從現在起就要有所準備」。十月七日，毛共政權就邊界談判一事發表聲明，聲言：「如果一小撮戰爭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襲擊中國的戰略要地，那就是戰爭，那就是侵略，七億中國人民就要奮起反抗，用革命戰爭消滅侵略戰爭」。直到一九七〇年元旦，毛共還把前述紀念口號，作為毛澤東的最新指示，寫進「兩報一刊」的聯合社論裏。

另一方面，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日，美駐波大使斯托塞爾（Walter J. Stoessel, Jr.）應邀參加南斯拉夫大使酒會時，曾與毛共代辦雷陽的譯員攀談，十一日再親往毛共「大使館」拜會雷陽晤談，重申美國恢復華沙會談的願望。一九七〇年一月八日，雷陽赴美使館回拜斯托塞爾，密談約兩小時。事後美國國務院於同日宣佈：美國與毛共雙方同意於同月二十日舉行一三五次會談。

一邊是來自北方的威迫，一邊是來自美國的利誘，那麼毛共來一次大轉身，聯美以制俄，難道不在情理之中？但這是實逼處此，換言之，毛共接近美國，就如同美國專欄作家艾索普（J. Alsop）所說是「一項投保行動」。但是，如果你認為毛共已把鬥爭的矛頭完全由美國轉向蘇聯，那不是你被別人所欺騙，就是被自己所欺騙。

三

說到戰略，倒可以借用史達林的解釋說，那是一種力量佈置計劃（註八）。在國際間從事外交鬥爭，總不能忽視我、友、敵三方面的力量。

尼克森外交政策的三條支柱：其一是實力地位——美國要保持足以作世界和平支柱的實力，在軍力尤其是軍事技術的優越性方面永保第一。這應該屬於「我」的力量之運用。其二是夥伴關係——美國與其盟邦平等合作，分擔責任，將一切資源加以適當配合，使受游擊、顛覆威脅者，也能提供自衛人力，以發揮自由世界的總體力量。這應該屬於「友」的力量之凝聚。其三是談判代替對抗——利用毛共和蘇聯的矛盾，以談判緩和和緊張，不為歧見而兵戎相見。這應該屬於「敵」的力量之分化。

一九七一年三月蘇共第二十四次大會，布里茲涅夫總結報告中所提出的蘇聯對外政策是：「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共同為建成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創造有利的國際條件；加強社會主義國家的一致和團結，加強它們的友誼和兄弟關係；支持民族解放運動，並同新興國家實行全面合作；一貫地堅持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和平共處的原則，給予帝國主義侵略勢力以堅決回擊」。

一九七三年元旦，毛共「兩報一刊」社論中透露的對外政策為：「進一步加強同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堅決支持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在五項原則

的基礎上，爭取和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和平共處」（註九）。

蘇共與毛共已互相敵對，但就對外政策的基本原則言，二者並無顯著差異，同樣是在國際間弄清敵、我、友三者的關係，區別開「誰是主要敵人，誰是次要敵人，誰是暫時的同盟者或間接的同盟者」，確定「依靠誰、團結誰、打倒誰」（註一〇）。

那麼美國和毛、俄之間是否相同呢？我們得承認，美國希望在均勢下維持和平，在和平下漸漸消弭敵（共產）我（自由）之間的矛盾。毛、俄則企圖在和平掩護下，促成量變質變，敵（自由）消我（共產）長，打破均勢以吞噬對方。

美國雖然正致力於國際和平結構，可是它的國防預算却在增加。正如同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海軍上將穆勒（Admiral Thomas H. Moorer）所說：「我們（美國）仍然面臨着這個最具決定性的問題：面對着其他大國不斷增強的軍事力量，我們應當怎樣盡力維護美國及其盟國的安全呢？」他認為：「我們必須以極端的謹慎和最深切的了解，來檢討目前的、計劃好的美國軍事態勢，以應付蘇聯和中共的軍事態勢。我們從事這樣的檢討時，應當首先注意軍事能力，而不必注意軍事意圖。我們不能夠確切的說出我們這些競爭對手的各項軍事政策和目標（亦即其意圖），……而且我們從經驗中獲知，意圖的改變遠較能力的改變為迅速」（註一一）。我們得說，美國並未鬆懈其增強實力地位的努力。

美國認為毛共與蘇聯分開對美國有利，過去美國接近蘇聯，促成了毛蘇的分歧，現今如果和毛共接近，也可收到同樣的效果。不管這是否事實或有可能，但美國確有如此想法（註一二）。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於下令轟炸越寮邊境共軍之後訪問北平。同年五月，雖然美國對北越的海防等港口佈雷封鎖，但由於他訪問毛共在先，蘇聯也不便中止對他的邀請，而仍然歡迎他往訪莫斯科（註一三）。尼克森訪毛共，和周恩來發表了一紙「上海公報」。尼克森訪蘇聯，簽署了一項條約、六項協定，雙方還發表了「美蘇關係基本原則」和「聯合公報」。看來，尼克森心目中的對手，確係莫斯科而非北平，他為毛共扭轉了國際孤立情勢，但其注視的焦點，却常常向着莫斯科。進入一九七三年，華盛頓和北平互設了聯絡辦事處，而布里茲涅夫也訪問了美國。儘管越南戰火停得如此可嘆，但美軍確已退出回國，若干美俘

也被釋放。我們得說，在談判方面，美國也算小有收穫，至少在目前是如此。

然而，在夥伴關係上，可不能不說是還有若干問題待決。季辛吉於一九六八年發表文章時，就表明了軍事二元、政治多元的觀念。他認為美蘇二強已不能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美國的外交政策，應努力建設一種新的世界秩序，以克服因多元化所導致的混亂與不安。不會有人否認，當前美國的外交政策，不少是出自季辛吉的設計。可是，一九六九年一月尼克森總統就職演說中的「談判時代」，一九七〇年二月第一次外交咨文中，在所謂強國能夠或應該支配弱國前途的時代已成過去的觀念下，提出的三條支柱的外交政策，無疑是促進了多元化、助長了混亂與不安的局面。一九七一年七月，尼克森將要訪問毛共的消息，來得過於突然，使得美國的盟邦感到震驚，對於美國瞞着它們秘密搞這項勾當，更不免心存怨對。為此，日本不會辨清方向就要匆忙趕上巴士。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訪問毛共，還只是初步接近的表示。同年九月田中角榮訪問北平，迫不及待地和毛共建了交。田中背棄了中華民國，也違反了一九六九年十一月美日聯合聲明之精神。而美日間又有貿易問題存在，難免芥蒂在胸。但美日關係的調整，在尼、季構想的新世界秩序中，仍然是重要的一環。問題是在日本的國際觀念中，似乎是經濟利益更重於政治責任。目前，日本醉心於等距離外交，它想對美、蘇、毛保持等距離，在多邊矛盾中尋求利己主義的目的。以日本的處境及其外交技巧言，那恐怕是不易達到的。今年四月二十九日，日通產相中曾根康弘在德黑蘭會見伊朗政府高級官員，當被詢及日本是否參加美國等擬議的石油消費同盟時，他的回答是：「日本不贊成對抗OPEC（石油輸出國機構）的同盟構想，它即使實現，日本也不參加」。日本似乎在石油輸出國和保有國際石油資本的消費國之間，也想要保持等距離，但日本畢竟是一個石油消費國，它能和石油輸出國永遠利害一致嗎？八面玲瓏也許會變成蝙蝠外交，最後為各方所不容。

尼克森和季辛吉不止一次地說明一九七三年是「歐洲年」。今年四月二十三日，季辛吉在紐約美聯社的年度餐會上發表演說時，又提出「新大西洋憲章」的呼籲，英國外務部認為那是一個團結的歐洲與美國合作的構想。但季辛吉在演說中，表明那個大西洋社會的「俱樂部」中，要把日本當作一個

「主要的夥伴」。我們願意說這「五極」中之「三極」的進一步合作，應該是美國三柱外交在與敵人初步「談判」之後，和進一步「談判」之前，團結「夥伴」的必然步驟。可是，日本會有此認識嗎？就歐洲共同市場國家的反應言，除英國外，也大都抱着「猜疑和保留」的態度。如果美國與西歐之間，能够在安全、貿易、貨幣改革和能源等問題上，坦誠討論、充分合作，加強大西洋兩岸國家的同盟關係，再加上日本的配合，那確可對世界和平有所貢獻。但歐洲國家始終執心的是，美國要以它對西歐安全的重要性，迫使歐洲共同市場在經濟貿易上對它讓步。龐畢度更不願前往美國去就尼克森，此二位總統的雷克維克會談，對「新大西洋憲章」的貢獻似乎不多。

當然，人們終有一天會領悟到自由世界團結的重要，但那是在一種什麼時機和什麼樣的情況下，不是十分重要而值得及早注意的嗎？所幸的是，最近西歐似乎也有所憬悟。

四

一九六八年八月的捷克事件，使蘇聯的聲譽遭受到一些損害，但它壓服了東歐的自由化和自主化傾向，對它加強在東歐方面的控制力量是有好處的。華沙公約組織已有常設聯軍，一九七一年七月「經濟互助委員會」在羅京布加勒斯特舉行第二十五次大會，通過一項「綜合綱領」，蘇聯所一直主張的「經濟一體化」就開始實施了。蘇聯正在緊緊控制着加之於東歐的軍事的和經濟的兩條紐帶。

自然，羅馬尼亞在赤色合唱團裏，還不時吐出吐不諧之音。不過，自從談判時代開始，羅共總書記、總統齊奧塞斯庫（N. Ceausescu）在國際間的橋樑作用減少了，他在外交上的光彩也就逐漸消褪。當屢次聲言不再重返蘇聯集團的狄托（J. B. Tito），也不能拒絕蘇聯十億美元貸款的誘惑，而與蘇聯維持一定程度的友好關係時，羅馬尼亞就難免執心自己陷於孤立了。去年七月羅共全國代表會議時，就已決定改善對蘇關係，加強與「經互會」的合作，而近來羅共也較前更多地參加東歐事務。蘇聯對其「夥伴」（它們列不進「極」內）的控制并未削弱。而且，正當中歐相互平衡裁軍聲中，和布里茲涅夫開始他訪問西德和美國的「和平之旅」之前，蘇聯突然在東歐增兵

兩師，並增加新式T六二型坦克一、二〇〇部，其用意就值得吟味了。

如果說美、蘇都想先加強其夥伴間的團結，再與敵對方面展開談判外交，那麼，毛共的夥伴在那裏？它給外蒙的援助，建設工程尙未完工就那樣交了出去，執行援助的職工也撤回大陸（註一四）。北韓不會疏遠蘇聯而一邊倒向毛共。北越亦復如此。而且，河內一向把中南半島三邦視作它的囊中物，北平却豢養一個施亞努，那可能是一個不諧的種子。一向是毛共忠實夥伴的阿爾巴尼亞，最近傳說也因對美政策不同而有了歧見，這雖然一時真假難辨，但它們之間的關係并未較前更為親密。此外，毛共自稱屬於第三世界，誇言朋友遍天下，然而，那果真都是朋友嗎？那樣多的國家，它們本身的立場是否一致呢？就以OAU（非洲統一組織）而言，今年五月二十五日是它成立十週年，二十四日起在衣索匹亞首都阿迪斯阿貝巴舉行慶祝，二十六日起舉行第十屆非洲國家和政府首腦會議，毛共煞有介事地予以祝賀、宣傳、鼓吹，可是那個首腦會議本身却是一片混亂，各國不僅對中東態度不一致，索馬利亞還把它和衣索匹亞的領土糾紛向會中提出，利比亞因與衣索匹亞不和，也要求把OAU總部由衣索匹亞移往其他非洲國家（註一五）。毛共能否只利用旁人而不捲入旁人的糾紛？如果像巴、孟（加拉）糾紛一樣，一旦介入，就少有迴旋的餘地了。更重要的是，毛共利用第三世界反對兩個超大大，那些國家都和兩個超大大（或其中之一）對立？毛共要旁人反帝反殖，而自已既和「美帝」握手，又容許英、葡長期佔據港、澳（註一六），究將如何自圓其說，而不令人生疑？我們得說，在夥伴這方面，毛共最差勁，所謂朋友滿天下，實際上是沒有一個真正的夥伴。

在「極」問外交尤其三角鬥爭當中，除了拉緊自己的夥伴外，同時還要拆散對方的夥伴。尼克森就任總統後半年，就於一九六九年八月初訪問了羅馬尼亞。一九七二年五月，尼克森結束訪蘇之行後，於三十日往訪伊朗，翌日再飛華沙，那絕非是路過加油。今年四月四日，美國副國務卿魯歇（Kenneth Rush）在馬里蘭州安那波里海軍官校演說時，強調美國對東歐政策的三原則，那就是：美國將把東歐每一個國家「作為一個有權擺脫一切外來干涉的獨立主權國家」與之交往；與東歐各國，努力建立一種「長期持續性的經濟關係」，辦法是擴大貿易和鼓勵東歐接受外國投資；美國將鼓勵東歐國家「越來越多地參與」整個歐洲的事務。五日，「紐約時報」評述說：

「魯歇的演說是一位政府高級官員多年來頭一次專談東歐問題的演說」。毛共的「新華社」也特別對此加以渲染（註一七）。但是，對蘇聯而言，這些恐怕是不受歡迎的。

其實，蘇聯倡議什麼歐洲安全會議、中歐相互平衡裁軍談判等等，正像英國「情報文摘」所指出的，其真正目的就在逼走歐洲美軍（註一八）。蘇聯擺出一付笑臉，製造一種和平假象，以鬆弛西歐的戒備，進而企圖結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使美軍撤出歐洲。蘇聯非常注意西歐與美國之間的矛盾，它對於西德尤其是戴高樂主義的法國，遠比對英國更為接近，那不是無因的。

在分化敵人陣營這方面，毛共是不甘示弱的。它經常抨擊蘇聯的「有限主權論」，斥其為社會帝國主義，指它把東歐國家當作殖民地，目的當然在離開蘇聯與東歐的關係。可是，東歐國家的領導者，有誰願意公開承認自己作了莫斯科的附庸，把自己的國家作了蘇聯的殖民地？在這方面毛共并不成功，反而招來不少反擊。毛共也揭露蘇聯對歐洲的陰謀，警告西歐提防那個歐洲安全會議，會變成為不安全會議。蘇聯經常指責毛共跟帝國主義集團唱同一個調子，引證英國保守派的「每日電訊」報報導，說毛共認為共同市場可以有效抵抗蘇聯的影響。毛共贊成一個強有力的西方聯盟，也就是要加強北大西洋軍事集團。蘇聯說毛共反對歐洲安全會議，不希望緊張局勢的緩和。又說毛共官方人士正向西德復仇主義集團提供挑撥性的資料，在領土問題上煽動民族主義的情緒（註一九）。

其實，蘇聯的指責并非無的放矢。遠的不說，今年五月中旬，周恩來對「法新社」社長讓·馬蘭（Jean Marin）談話時就說過：「不管是在我們的正式文件中，還是在聯合國講壇上，我們都支持歐洲共同體」。但毛共的矛頭決非單刃，毛共經常指責美蘇包辦歐安會，因此周恩來說：「如果問題都應該完全由美國和蘇聯來解決，那就不可能進行討論了」（註二〇）。最近姬鵬飛訪問歐洲，也仍然在唱反超大、反霸權的老調。

關於季辛吉提出的「新大西洋憲章」，據說周恩來也表示：他感到沒有理由拒絕該項計劃，倘使其目的在聯結意見一致的人士，以對付蘇聯的擴張主義政策的話（註二一）。

據「合衆國際社」六月十五日發自哥本哈根的電訊，十五個北約國家外

長，經過兩天的會議，已接納美國建議，決議強化盟約關係，而美法的歧見也已消除。看來「新大西洋憲章」的構想或許不致被完全擱置。在一種比較團結的情況下，參加歐安會和平衡裁軍談判，當是一項明智之舉。

五

在近年來的「角」鬥「極」交中，獲利最多的倒是毛共。這個在經濟上最落後，困難最多的偽政權，沒有憲法、沒有元首、沒有國防部長，人代會開不成、黨代會也開不成。這些是該有、該開的，也終有一天（假如它還不曾覆滅）要有、要開的，然而現在就不曾有、就不能開，那不就證明它內部的困難與不安嗎？

可是，談到外交，它由絕對孤立，一腳踏進了聯合國，很快地與幾十個國家建了交。那分明是由於蘇聯壓力沈重引來了美國的援手，它是因禍得福了！

從一九七〇年八月的德蘇條約開始，接着是波德條約、東西德基本條約，而捷克和西德間的條約，似乎也為期不遠了。由於這些條約的簽訂，戰後的歐洲疆界固定，東德的國際地位提高了，那不正符合蘇聯的願望？蘇聯同樣在利用它和毛共的裂痕，故意作出西守東攻的姿態，騙取了包括經濟技術合作在內的不少實際利益。

美國所得的是什麼？仍然要列舉那個拖泥帶水的中南半島問題，和仍待建立的新秩序。

蘇聯當然也有內部困難，不過布里茲涅夫正處於權力巔峯狀態，他迫不及待地提前於六月十六日（原定十八日）飛抵美國，十七日與季辛吉會晤，十八日再與尼克森開始正式會談。他已經一再表明，他不利用水門事件向尼克森進行勒索。如果此話屬實，也並非出自他的善心誠意，而是由於他有求於美國。這次首腦會談將涉及美蘇關係問題、限制戰略武器問題、歐安會議問題、平衡裁軍問題、中南半島問題及中東問題等等，範圍是相當廣泛。本文脫稿於實際會談之前，且其具體內容與結果也不在「淺談」範圍之內。我們只願指出蘇聯的重要目的，恐怕是貿易和經濟技術合作問題。在軍事方面，蘇聯的洲際飛彈在數量上超過美國，一說其核子潛艇領先美國五年（註二）

二）。此外，它在歐洲、中東和中南半島的影響力，使得美國不能忽視。這些可作為它的王牌。

一談到經濟問題，蘇聯就慘了。由於農業失敗，去年向西方購糧三、八〇〇萬噸，耗資二〇億美元，售出黃金一八〇噸，今年將要售出三〇〇噸，不過，它還準備向國外借款。而蘇聯的工業生產，已到了非引進西方資金、設備、技術，就無法挽救其危機的地步，要如此，布里茲涅夫才不得不親自跑到波昂和華盛頓。在這方面，美國就握有王牌了。據推測，美蘇貿易到一九八〇年時可能增至五〇億美元。又美國兩家公司和蘇聯簽訂初步協議，打算投資一〇〇億美元，開發西伯利亞的天然氣，使得美國家庭也可使用蘇聯的瓦斯。到一九八〇年時，蘇聯雅庫特天然氣產量會增加到三億噸。反過來說，這些對美國也未嘗不是一種誘惑啊！

毛共在資源開發方面沒有這樣厚本錢，在貿易增加方面沒有這樣大手筆。蘇聯要和日本合作開發秋明油田，允諾對雅庫特天然氣的開發，日本有優先權（註二三），這會使得日本飄飄然，毛共每年三〇〇萬噸石油的供應，就算不得什麼誘惑了。

如果說當前的極間外交，是大國之間在實力地位的基礎上玩弄均勢，那麼，毛共手裏沒有一張王牌，濫竽其間，終會身敗名裂的啊！

擺在眼前的是，毛共只是美蘇矛盾鬥爭中的一顆棋子。當美蘇關係較前接近時，這顆棋子還有多少分量？誰能保證布里茲涅夫和尼克森為時一週的會談，就談不到對毛共關係的問題？假如西歐都不願美蘇兩國越過它們而過度接近，難道毛共不在為此焦灼、憂慮！

註一：季辛吉論點，摘自其一九六二年發表之「國內體制與外交政策」一文。

註二：一九六七年九月，毛澤東對清算王力問題和批判陳毅問題的指示中有幾句話：「對外路線是我制定的，周總理執行的，你們打擊面太寬，反到我這裏來了」。又，周恩來屢次對外人說兵兵外交是毛澤東所決定。毛共報刊不斷吹噓當前所執行的是毛澤東的「革命外交」路線。

註三：謝列斯特原任烏克蘭共黨第一書記，為極力主張武裝干涉捷克而反對尼克森訪蘇之強硬派，一九七二年五月即已被免去第一書記職務，而降陞部長會議副主席（副總理）。沃羅諾夫原任俄羅斯聯盟共和國部長會議主

席(總理)，在農業上與布魯有歧見，一九七一年七月即被免去該職。現二人又被逐出政治局。

註四：前特務頭子貝利亞(Lavrentiy Pavlovich Beria)於一九五三年被殺，前外交部長莫洛托夫(Vyacheslav Mikhailovich Molotov)及前國防部長朱可夫(Georgiy Konstantinovich Zhukov)於一九五七年被逐出主席團(今之政治局)後，保安、外交、國防負責人之進入政治局，現尚為首次。且葛羅米柯及格列奇柯均非政治局候補委員，係由中央委員選升為政治局委員。

註五：尼克森對美國作家懷特(Theodore H. White)曾有此表示。

註六：尼克森此次訪問的國家，計有：菲律賓、印尼、泰國、越南、印度、巴基斯坦和羅馬尼亞。

註七：一九七三年六月一日合衆國際社華盛頓電，專欄作家安德森報導說：尼克森「巧妙地隔離開兩個敵對的共黨國家」。他說：蘇聯開始於一九六四年加強其邊境防務，自一九六九年起經常暗示它可能對毛共的核子設施發動攻擊。見翌日聯合報第一版。

註八：參閱史達林著「論列寧主義基礎」。

註九：其詳應為：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下，發展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之間的友好互助合作關係；支援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在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爭取和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和平共處，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從一九六一年六月三十日劉少奇在毛共建黨四十週年紀念會的講話，經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七日毛共發表的「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十二月十二日的「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六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一九六五年一月四日第三屆「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的「關於政府工作報告的決議」，以至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林彪在九大的政治報告，三項原則基本未變。

註一〇：引自一九七一年毛共「紅旗」雜誌第九期刊載之「中國共產黨湖北省委員會寫作小組」文章：「團結人民戰勝敵人的強大武器——學習『論政策』」。這些原則同樣可適用於蘇共。此文係為尼克森宣布訪問大陸後，毛共對內解釋其策略轉換的教育性文件，不應視為老生常談。

註一：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六日穆勒將軍出席美國參議院撥款委員會的國防經費小組委員會所作國防預算的說明。何樹生子以節譯，標題為「今日世界軍事力量實況」，刊於同年六月號「今日世界」一一—一三頁。

註二：參閱哈佛大學出版莫斯汀(Richard Moorsteen)艾布維茨(Morton Abramowitz)原著「美國對中共政策計劃書」。國內有郭榮趙先生節譯本，中國研究中心出版社印行。

註三：一九六八年時，詹森總統曾預定訪蘇，嗣因捷克事件而被蘇聯擱置。

註四：一九七三年三月廿七日「新華社」北平電。

註五：參閱一九七三年五月廿九日日本「每日新聞」有關報導。

註六：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二日黑魯曉夫曾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中，對港澳事加以譏笑；一九七三年六月十日蘇聯廣播，又就香港問題對毛共加以抨擊。

註七：一九七三年四月八日「新華社」北平電。

註八：參閱一九七三年六月份英國「情報文摘」，中央社有譯稿，六月十四日大華晚報曾予揭載。

註九：一九七三年六月十四日蘇聯華語廣播談話「歐洲的安全有利於全世界人民」。

註一〇：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日香港「大公報」譯載「法新社」北平十六日電。

註一一：同年六月五日星島日報第一版「路透社」東京四日電，周恩來係對日人川崎秀二作此表示。

註一二：同年六月三日日本「朝日新聞」第七頁載「美聯社」華盛頓一日電。

註一三：同年六月十三日「日本經濟新聞」晚刊第二面載該報駐莫斯科記者齋藤十二日電訊報導，蘇聯對外貿易部副部長鄂希柯夫對正在蘇聯訪問的「日蘇經濟委員會」天然氣委員長(東京瓦斯會長)安西浩曾有此表示。